

弗兰克与社会科学建构的全球视野

刘 玉 能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critical study on A. G. Frank's methodology for world-system study. It includes four parts: Frank's dependency theory and its problems, Frank's critiques of Eurocentric social theories, Frank's methodology on restructuring global theory and some remark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Frank's recent thoughts will be of benefit to rebuilding the open social sciences toward all nations.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长期致力于揭露各种流行社会理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真面目,构建一种反映人类社会大家庭真实面貌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本世纪60年代后期,当“现代化理论”之旗正在社会发展领域上空猎猎飘扬时,他根据自己在拉美国家的实地观察,提出依附理论,向“现代化理论”挑战,将社会发展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30多年后,正当人们高谈阔论“全球化”之际,弗兰克又于1998年推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弗兰克,1998/2000)一书,将自己近十几年来对于全球体系的研究成果综合成一个系统的体系。这部著作既是对全球经济社会体系研究的推进,又是对包括他本人曾倡导的依附理论在内的关于现代社会尤其是世界体系的各种社会理论观念的系统的颠覆和清算。弗兰克指出现有的一切社会理论实质上都是欧洲/西方中心论,要想对世界体系有一个全面的科学认识,就必须彻底摒弃这些形形色色的欧洲/西方中心论,代之以彻底的全球视野,并以此构建符合世界历史本来面目的真正的社会科学。为此,他就如何进行世界体系研究提出了一整套研究框架,并依此对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史作了系统的研究。本文不准备全面介绍弗兰克关于世界体系研究的所有成果,而只就他关于如何研究世界体系的方法论思想作一些分析和评论,希望对于当前的“全球化”讨论有所帮助。

原先的弗兰克:以欧洲为中心的依附理论

二战以后,随着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相继独立,对不发达国家及其发展路径选择的研究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社会科学为此而产生的第一期成果就是“现代化理论”。以美国社会学家M. 利维, W. 穆尔, D. 勒纳, R. 贝拉, D. 阿普特和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用西方社会学观点来解释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他们沿袭西方社会学的知识传统把社会发展过程二分为对立的传统—现代、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两个类型,认为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化理论”归纳出来的所有现代化特征都是从西方现代化历史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而且是经过西方社会学家“提炼”过的一种“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类型”不仅非西方的不发达社会难以达到,就是西方发达社会本身也不可能完全与它吻合。因此,运用这样一种“理想类型”作为检验尺度到非西方社会内

部去寻找有没有这些“现代化特征”以及这些社会与这种“理想类型”有多大差距,以此来解释这些社会不发达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是令人怀疑的,但是最初人们却对此深信不疑。一直到本世纪60年代后期,弗兰克等学者才站出来跟它叫板。弗兰克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1967)、《拉丁美洲:不发达或革命》(1969)。

弗兰克(以及稍后的美国社会学家F.卡多索、埃及经济学家S.阿明等)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过程,掩盖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宗主国(中心)一卫星国(边陲)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在这一资本主义秩序下发展中国家之不发达的根源,不能只从这些国家内部,而必须到这些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和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剥削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弗兰克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就是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纳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中心—边陲”经济体系的依附化的过程,这个依附化过程导致了两种结果:西方国家的发达和非西方国家的不发达(苏国勋、严立贤,1991)。这就是依附论研究范式的大致轮廓。

依附论范式也有自身的不足,因而受到许多批评。在《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一书中,弗兰克把这些批评概括为三点:(1)批评依附论强调交换关系而忽视了“内部”生产方式;(2)批评依附论没有充分考虑拉美和世界各地的差异,没有充分考虑发展的不同阶段;(3)批评依附论没有真正对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进行辩证的动态分析,在这种资本积累中,宗主国经济发展与附属国外围的不发达理应作为单一进程的一部分来分解(弗兰克,1978/1999:序言,2)。这些批评促使弗兰克在1970年以后对依附论作了一些修补,但因为受到皮诺切特政变的影响和资料所限,这些修补不能顺利进行,最后成文并面世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调查资本积累周期以及世界各部分在各个时期相互关系,以此扩大并加深了历史分析。这便是1978年出版的《世界积累:1492—1789》。二是通过对世界积累进程中依附性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分析来说明不发达问题。他为此撰写了后来成为《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1978/1999)一书第三、五、七章的三篇长文。该书第三章试图解答为什么各个殖民地早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走上发展和不发达的不同方向。弗兰克认为,殖民地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结合,促成不发达的发展的开始,而新英格兰由于“故意被置之不理”而缺乏这种结合却反而使它能够得到发展(其他自耕农社会不在此例)。第五章修正了作者在《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一书中强调收入分配在内部市场发展中的作用的立场,讨论了内部市场的规模、联系效应、新生工业以及进口替代政策和技术的差距、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进程中部门区别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问题。第七章重点研究1870—1930年间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实际商品贸易格局以及它的失衡如何促成了发达国家的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弗兰克,1978/1999:序,4—5)。

由以上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弗兰克的依附论的研究视角是有所变化和发展的,即由初期的“外部关系论”发展到“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的“结合论”。第二、其根本认识范式没有变化,即没有离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也就是说弗兰克仍把世界体系等同于或局限于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有限的视野对于认识更宽广的世界体系是不利的。后来,弗兰克认识到这种视野仍然是一种欧洲/西方中心论,而欧洲/西方中心论正是依附论坚决反对的“现代化理论”的根底。弗兰克认为,要使世界体系研究向前推进,建构真正面向全人类的社会科学,就必须代之以一种彻底的全球学的人类中心论。这一设想是通过《白银资本》一书来系统化的。

一切流行的社会理论都是欧洲中心论

任何理论观点的提出,都是基于对已有理论观点的不满,这是科学范式转变的起点。弗兰克也不例外。在弗兰克心中,要想构建一门不带有民族、区域偏见的人类中心论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首先得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区域中心论观念进行彻底清算,目前,主要是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清算。弗兰克和许多同道一起,或者说在其他学者思想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各种欧洲/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判。

弗兰克认为,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兴起之前,至少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曾有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弗兰克,1998/2000:33)。① 例如突尼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1332—1406)在对“各国财富”进行比较时,就把埃及、叙利亚、印度、中国与地中海以北地区包括在内。18世纪法国最博学的中国事务专栏作家杜·哈尔德(Du Halde)还写到:“……中国境内展开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在多卷本的《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作用》巨著中,拉契(D. Lach)和范克利(E. van Kley)认为“十六世纪的欧洲人把日本和中国看作是未来的最大指望”,到17世纪末,“在有文化的欧洲人中几乎没有人完全不被(亚洲的形象)所触动”。当时印度被看作世界上最富有的、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则始终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被欧洲人当作最高的榜样。可是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亚洲,尤其对中国的看法急转直下。过去欧洲人把中国当作榜样和模式,现在则称中国人为“始终停滞的民族”。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洲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38—39)。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和20世纪“经典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比18世纪那种比较现实地理解世界的欧洲视野后退了一大步。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弗兰克对几种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对马克思和韦伯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一般人把马克思和韦伯这两位思想大师看作是对立的,但是在弗兰克眼里他们都是欧洲中心论者。他们二人都认为所谓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因素。“这就是马克思的‘东方学’假设、韦伯的大量研究以及二人发表的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无稽之谈的落脚点。”(39)弗兰克指出,马克思在描述亚洲的特点时有选择地利用了他所能获得的资料。在对马克思产生过影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曾表示感谢有关中国以及埃及和印度斯坦的财富与发展的精彩报道。但是,在这方面,马克思更偏爱孟德斯鸠、卢梭和詹姆斯·穆勒等人,这些人“发现”“专制主义”乃是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马克思断言,在中国、波斯、奥斯曼帝国、印度这些地方有一种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断言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和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侵入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弗兰克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这些特征不过是他和其他欧洲中心论思想家想像的产物,在实际历史中根本没有依据。”(41)

与马克思相比,韦伯只是把马克思和松巴特关于欧洲起源和“资本主义”特征的那些广泛说法表现得更好一些。松巴特已经把欧洲的合理性以及他所谓犹太教根源说成是资本主义及其在欧洲诞生的绝对必要条件。韦伯接受了这种说法,并进一步修饰了马克思所谓以水利为基础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观点,断言亚洲单靠自身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更不用说发展“资

① 下面凡引本书的,均只标页码。

本主义”了。因为韦伯对亚洲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多一些(凭借其对亚洲宗教、城市、官僚制的研究),所以他的论述比马克思的论述更复杂更精致。例如韦伯承认亚洲有大城市,但它们必须被设法说成在结构和功能上与欧洲城市有“根本区别”。马克思认为亚洲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韦伯则增添了另一缺乏,即缺乏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长的新教伦理。其实马克思和韦伯是殊途同归,而且韦伯的观点比马克思的观点更难让人理解,因为所谓有无新教伦理的说法根本无法解释这样的现实,有新教伦理的地方不一定都有发达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地方也不一定都有新教伦理。

对经济史学家的批判。人们往往天真地认为经济史学家是可以信赖的,因为大家认为经济史研究是务实的。但是弗兰克提醒人们:“其实他们(经济史学家)是最能胡作非为的。”(52)大多数自封的“经济史学家”完全无视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历史,而少数人则彻底地歪曲这些地区的历史。多数经济史学家根本没有世界视野,甚至没有一种欧洲视野。

诺斯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个新经济史》(1973)一书,其视野和观点都是欧洲中心论的:“西欧的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乃是西方兴起的原因”(North and Thomas 1973:1)。更为严重的是,极少数经济史学家在谈到“其他地区”时通常都对“东方”及其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作了极其严重的歪曲。在他们心目中,“世界经济”是从欧洲产生的,欧洲以自身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世界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也在欧洲内部寻找西方兴起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了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在塑造着各个社会(55)。

对各种全球观的批判。自弗兰克提出依附论以来,许多学者在寻找超越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另一种视野,产生了多种形式的世界视野或曰全球视野。例如沃勒斯坦(1974/1998)和布罗代尔(1979/1992)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以及1990年代以来成为热点的“全球化”讨论。这些讨论及其成果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世界体系的认识,但是弗兰克认为,这些所谓世界视野(包括依附论在内)仍然是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因为他们所说的世界体系仍然是15世纪以后甚至只是17世纪以后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比如,布罗代尔考察1500年以来的世界的“世界视野”比大多数人都广阔得多,但是他把世界区分为一个“欧洲的世界经济”与若干个其他孤立的外部“世界经济”。他和马克思一样,“他们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使他们确信,任何历史模式和社会理论,无论是否具有普遍主义性质,都必须完全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59)。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和弗兰克本人的《世界积累》(1978)和《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1978/1999)也是旨在对欧洲扩张和资本主义发展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影响做出的系统的论述。他们二人都强调欧洲扩张给其他许多地区造成“低度发展”的消极影响,以及这些地区对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的资本积累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但是他们二人都局限于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与过程提出概括模式和进行理论分析。弗兰克当时认为,沃勒斯坦现在仍认为,这个体系是以欧洲为中心,从欧洲向外扩张,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到以欧洲为基础的体系。这是沃勒斯坦和当时的弗兰克的理论的局限。弗兰克现在认为:“这种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模式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与我们真正需要的关于完整的实际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背道而驰……无论我们多么想具有世界眼光,但只要我们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在那里寻找借以建构我们的理论的证据,我们的世界眼光就不会被开发出来。”(60)总的来说,所有欧洲中心论偏见歪曲了我们对西方之外的现实的感知,甚至使我们变成视而不见的睁眼瞎。而且,欧洲中心论也妨碍和歪曲着我们对欧洲和西方本身的现实的认

识。因此，它根本不可能去理解一个整体世界的现实。

那么，这种偏见产生的原因何在？弗兰克指出至少有两点：一是现实的根源，即近 200 年来西方世界经济社会的突飞猛进，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从而使人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关注西方，这种情形被弗兰克形象地比喻为“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张望”（57, 60）。依笔者之见，“成功效应”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思维定势。在人的观念中，凡是成功的必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反之，凡是失败的则必有其不合理性和缺陷。成则皆誉，败则皆毁。学者们并不比常人好多少。二是二分法和其他划分方法的“理想类型”作怪。弗兰克认为这种“理想类型”分析法有如下特点，首先在它提出的基本社会文化特征和差异中，想像的成分远远多于现实成分。其次，它断言这些差异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也把“现在”与“过去”区分开来。另外，各种“理想类型”把某种原初的自我发展归诸某些民族——主要是归诸西方，然后从这里（积极地）扩散到别处或（消极地）强加给别处（45）。它实质上浸透着欧洲人和西方人的偏见和自负。现在，在揭开了这些社会理论的假面具之后，弗兰克要做的工作就是提供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

以彻底的全球视野重构世界图景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批判了各种欧洲中心论，考察了 1500—1800 年的世界经济史之后，作为全书的结论，对其全球整体主义的世界视野作了总结。其基本观点大致有如下几点。

整体主义而不是部分主义。弗兰克多次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且塑造这些部分本身。我们必须把世界当作是一个人类整体，而且这个人类整体是一个由多个部分和层次构成的全球的整体。早在 1993 年，弗兰克和吉斯(B. K. Gills)就对全球整体提出过一个“三条腿凳子”的比喻，认为全球整体是由生态—经济—技术腿、政治—军事力量腿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腿共同构成的，要想对全球整体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理解，就必须同时对这三条腿进行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各种研究很容易忽略某条腿。首先，人们，包括弗兰克在内，最容易忽视生态因素。其次，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经济基础，尽管有所谓“经济史”。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经济史专家根本无视它。经济学家把它错误地说成是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民族”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学者把所谓“民族”国家当作基本单位而研究他们所说的“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世界体系分析家也仅仅局限于分析世界体系中以欧洲为中心的那一小部分，弗兰克的探讨也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腿中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451—452）。

强调共性和相似，而不是特殊性和差异。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习惯于寻找和强调各个“文明”、“文化”或“社会”的独特之处及其各自的历史进程和事件，而弗兰克则强调共性比差异更普遍、更重要，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差异。弗兰克认为许多所谓差异在最好的情况下至多是同一个根本性功能结构和进程的一些表面上的制度和“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许多具体的“差异”本身是由一个共同的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造成的。因为全球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因此只有基于全球整体视野，才能充分理解各个部分以及为什么相互之间有差异（452—453）。

强调连续性而不是不连续性。人们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存在一种历史分期的痼癖，总

认为现在或者最近的过去标志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起点。关于现代社会或世界体系的产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观念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急剧的根本性的变化。而弗兰克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如果我们用更整体主义的视野来看整个世界,历史的连续性会显得更长远(454)。

横向整合而不是纵向分割。弗兰克赞同美国历史学家弗莱彻(T. Fletcher)关于历史研究的观点。弗莱彻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联系却视而不见”,尤其是美国大学引进“地区研究”以后,造成了“一种微观历史眼光,甚至狭隘的地方眼光”,使传统方法及其使用者的视力变得更糟糕了(Fletcher, 1985: 39—40)。为此,弗莱彻建议使用一种全球横向的历史分析视野。这种分析视野的基本思想是:“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Fletcher, 1985: 38)。

周期而非直线。进化论是近代以来主导社会历史研究的主流观念。这种观念与断裂性、不连续性观念直接相关。可是弗兰克指出:“连续性不一定是直线,而横向整合也不一定是整齐划一的”(459)。各种关于同时性的横向平行现象的发现以及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考察显示,历史表现为周期性,“周期性运转似乎是万物的普遍特征”(460)。弗兰克把世界历史周期性发展比喻为潮水和涨与落,而把各个国家比喻为潮上的船只。世界历史的周期发展包括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在A阶段,上涨的潮水会涌动所有的船只,提升它们的位置,便利它们的航行。它扩大和促进了这些船只彼此之间的联系,但也不能保证在最好的时机不会出现沉船。在B阶段,潮水下落会造成社会活动可能性的紧缩和限制,导致许多船只沉没或搁浅。它也会使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单位”彼此分裂,并可能导致整个世界体系崩溃。但是这种分裂或“内卷化”是参与世界体系的结果,而不是没有世界体系的表现。在这个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过程中,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都会同时受到相同力量和事件的影响,它们的命运如何就在于它自己能否和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种涨落的变化,能否和多大程度上作出相应的调整或把握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固定的输家,也没有固定的赢家,世界体系的中心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因此,研究世界的周期性波动会有助于认识世界体系(460—464)。

强调世界的多样性的统一。弗兰克认为多样性的统一是世界结构的总特征,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结构才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性”(465)。弗兰克把协助人们建立一个认知基础,使得人们承认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和赞美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作为他自己写作《白银资本》一书的宗旨(474)。弗兰克遗憾地看到今天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仍然在竭力否认、破坏和扭曲这种多样性的统一。硕学鸿儒们甚至鼓动老百姓来反对统一性,动员“我们去反对‘他们’”,例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它们都基于一种分裂主义历史观——“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而为这些论调提供合作性基础的就是欧洲/西方中心论。

几点评论

1. 弗兰克关于世界体系研究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实质上仍然是欧洲/西方中心论视角的依附论,发展到以人类整体为中心的彻底的全球论。弗兰克虽然主要批判的是欧洲/西方中心论,但在他的观念中顺理成章地也反对任何形式的非人类整体中心论。他提醒我们,不能从欧洲/西方中心论转变为中国中心论、阿拉伯中心论、东方中心论或其他什么形式的中心论。如果有什么中心论的话,那只能是作为整体的人类中心论。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因为学

者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其思想很容易受到“出人头地”、“我欲为尊为大”的欲望的投射。这种欲望容易遮住我们观察现实的双眼。

2 弗兰克不仅要把我们带入一个比过去任何一个理论家所提供的世界更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或有可能看到世界历史现实中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而且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比较具体的方法论概念体系,可能使我们对彻底的全球视野有一个具体的把握,因而有可能更好地付诸研究实践。更宽广的横向分析与更久远的纵向分析相结合,这是弗兰克世界体系研究提供给我们的言简意赅而意义重大的忠告。拥有这样一个理论自觉,我们在认识世界时将会做得更好。

3 这样一种彻底的全球研究观虽由弗兰克系统化,但功劳不能仅归于他一人。霍奇森(M. Hodgson)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后来出版的《重新思考世界历史》(1993)一书中提出要超越欧洲去认识世界的重要性。布劳特(J. M. Blaut)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论与欧洲中心历史学》(1993)一书中对欧洲中心论神话作了认真的考察,并得出结论说由欧洲中心论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人类学家古迪(M. Goody)通过考察西亚、南亚和东亚的现代化成就批驳了韦伯所谓“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成就”的种种论断(Goody, 1996)。阿散蒂(M. K. Asante)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欧洲中心论理论家)实质上是某种自负的俘虏。他们不懂得自己的无知之处究竟何在,而他们说起话来,仿佛他们知道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Asante 1987: 4)显然,这些学者的思想为弗兰克后期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帮助,至少可以说弗兰克从中看到了更多的思想同道。在这个意义上,弗兰克的后期思想是对近几十年来有关世界体系研究成果的一个综合。无论如何,弗兰克的努力使世界体系研究的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将对重构面向全人类的开放的社会科学具有较大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弗兰克, 1999,《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钰、高戈译,译林出版社。

——, 2000,《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沃勒斯坦, 1998,《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布罗代尔, 1992,《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

苏国勋、严立贤, 1991,“社会发展理论”,载《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Asante, M. K. 1987, *The Afrocentric Ide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laut, J. M.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Guilford Press.

Fletcher, J. 1985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 in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9: (1985)37—58.

Frank, A. G.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69,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Hodgson, M. G. S. 1993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dited by Edmund Burk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N. C. and R.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硕士
责任编辑: 罗红光